

《突破書誌》 打開另類文化媒體空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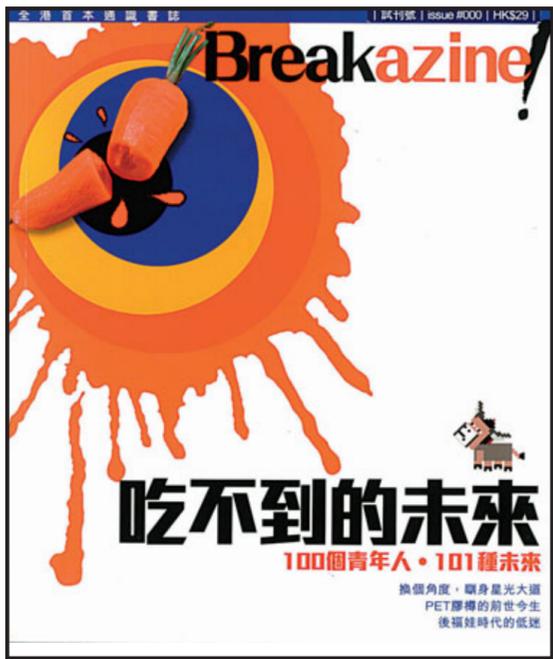
香港還有文化雜誌嗎？

70、80年代的經濟起飛，也曾是本地文化雜誌的黃金歲月，之後便花果飄零了。最有口碑的幾個，要麼如《電影雙周刊》跑到網上做實驗，要麼如《號外》，換了東家，人面桃花。

《突破書誌》是一個例外。它的前身《突破》雜誌創辦於70年代中，是本地基督教非牟利青少年服務團體突破機構旗下的出版之一。儘管有宗教背景，但一些60後、70後的人對其開放性仍記憶猶新。

幾經變遷，09年起航的雙月刊《突破書誌》，秉承以青少年為服務對象的傳統，在與讀者參與性、話題熱點、視覺設計、多媒體傳播等方面，都見了心思。現每月5,000本的發行量，在早已蕭條的文化雜誌界，竟顯示出強韌的生命力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最新一期的《突破書誌》的標題和封面設計，在facebook被傳開，不少人在「窮得只派錢」的下面點擊了「like」，更有人從封面的漫畫中讀出了隱喻。從便利店的雜誌檔掃過，那個粉光紅會在一堆明星像和風光片中吸引目光。近90頁，從人物訪問到專欄到影像，討論近期政府派發6,000元藏富於民背後的「迷思」。

「嚴格來講我們不算是雜誌。」總編輯梁柏堅在接受電話訪問時說：「首先，我們1個專題做50多版，1年前，還要求專欄文章也要配合主題。其次，話題的時效性也不像普通雜誌那麼強。這是一種做書的手法。」書展期間，突破機構更出了《突破書誌》的套裝，將過往的出版結冊。哲學和基督教研究學出身的梁柏堅在突破機構服務超過15年，曾任職過圖書編輯、網絡總監以及機構下免費學生刊物《U+》總編輯。



因為機構性質，《書誌》瞄準年輕群體，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。「這和我們機構一直來的理念有關。青年人在社會中沒權沒錢，他們是對社會感知最敏感和最直接的人。如果我們能傾聽他們的聲音，也是對當下社會脈動的一個捕捉。」梁柏堅說，一般談到青年狀況，用統計數字是常用的方法，但數字背後的那些人是怎樣的，讀者永遠也不會知道。「這是對青年人的尊重。」



《書誌》創刊之始，編輯團隊有了一個大膽嘗試：每期去採訪100位不同背景的年輕人，並拍下他們的半身人像。出版至今，加上試刊號，《書誌》已邀請過1,600位年輕人。



「100個受訪者的概念，來自很多年前日本的一本繪本《如果世界是100人村》，用百分比的方法，講述世界上的貧富差距問題。我們也想用類似的百分比訪問。」



100個人怎麼找？「初期的選擇比較隨機，後來有做社會研究的朋友，建議我們要考慮不同背景和小群的人，取樣才比較科學。」

「學校的中小學生比例比較大，然後我們會請受訪者介紹他／她的朋友圈，編輯同事也會有自己的朋友圈。比如以這期《窮得只派錢》為例，突破機構早前在香港舉辦過國際華人領袖訓練營，主題便是貧富懸殊問題，全世界各地來的年輕人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，這些都成為《書誌》裡面的聲音。」

批判立場帶來新盼望

70年代的《突破》雜誌，已有較強的社會參與意識，談價值觀，談性，談民權，但雜誌仍有明顯的宗教色彩，強調個人信仰。到了《書誌》，傳教的部分似乎不再被看見。「這和世界整體環境有關。」梁柏堅說，「世界變得日益複雜，導致基督教的



■突破書誌日常開會



■突破書誌義工活動

世界觀也在發生變化。香港人從早年講信仰，到逐漸對信仰產生了不同理解，其實這背後是想同現代社會多點對話。此外，我們仍然強調的角度，力圖點破那些捆綁人性的迷思，比如社會對綜援人士貼的標籤。」

《書誌》出的16期，聊戒毒，聊旅行，聊自然物種。「我們一方面批判社會問題，但另一方面也想帶來一種新希望。罵有錢人不是我們的目的，而是通過對受苦人的關注，讓大家擺脫對貧窮的恐懼。」

梁柏堅說，他們會提前半年定下主題，再通過對年輕人的訪問，收集他們對話題的看法，再由編輯團隊做修改和調整。如此大的工作量，除了總編輯，《書誌》的全職編輯只有4人，其餘工作人員在突破機構還兼任其他工作。《書誌》還特別重視多媒體的傳播方式，設有網上互動，更鼓勵錄像作品。為了發動更多年輕人的參與，同時也緩解編輯部門的資源壓力，《書誌》還設有義工招募。「我們會對報名者進行面試審核。」

市場解決不了的事……

《書誌》每期定價為港幣29元，吸引力並不是很高。由於機構性質，加上保持內容的純粹性，梁柏堅和他的團隊難免面臨市場壓力。目前《書誌》靠本地學校的圖書館訂閱、便利店零售為主要發行渠道，突破機構、社會人士，以及基金的支持都是維持雜誌運營的重要資源。梁柏堅承認，儘管《書誌》不是傳統類型的商業雜誌，但反而有空間做更多事情。「比如我們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配對，捐贈機構可以為他們訂閱《書誌》。這樣也可以讓我們的影響深入家庭。」

視覺設計是《突破》歷來的傳統，70年代已不惜工本，使用海報畫做封面，在同類雜誌標榜。現在的《書誌》，每期都找來不同的獨立設計師合作。「不是為我們服務，他們都要有自己的觀點。」

文化雜誌也許在香港已死，但另一種文化媒體空間則在悄悄成長。

N城記：上海/北京

文：小蝴蝶

東方西方

無論是迎合國際創意寫作潮流的「以文會友」，還是暗自含有意識形態擴張的野心，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主辦的「上海寫作計劃」從2008年起，每年邀請一批外國作家作為「駐市作家」，共同在滬生活兩個月，參與文學交流和寫作項目。與以往對所有對外文化交流事項的敏感不同，作協的這個計劃得到了政府財政專項撥款，涵蓋相關所有招待、活動經費以及全部駐市作家的往返機票、住宿和每人每天100人民幣的零用錢。官方將寫作計劃的意義解釋為：「以期增進外國作家對上海和上海文學的了解，提高上海城市文化形象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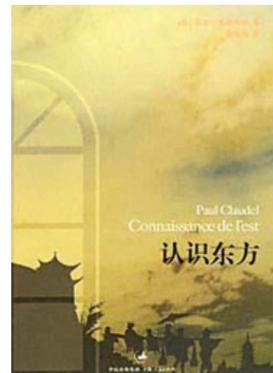
駐市作家候選人多由外國領館和文學機構推薦，也有一些對中國心嚮往之的作家們自薦，今年的上海駐市作家有：法國作家阿爾瑪布拉米(Alma Brami)，英籍印度裔作家阿邁勒查特吉(Amal Chatterjee)，愛爾蘭作家科爾姆佈雷斯納克(Colm Breathnach)，墨西哥作家克里斯蒂娜瑞斯康卡斯特羅(Cristina Rascon Castro)，澳大利亞兼作家、表演藝術家、音樂家和詞作者於一身的琳達尼爾(Linda Neil)，瑞士(法國)小說家、詩人瑞麥非利普(Rahmy Philippe)，以及印度詩人蘇迪普森(Sudeep Sen)。正由於他們的地緣特質，作協將報告會的主題定為略有些誇張的「文學與東西方的未來」。

或許英籍印度裔作家阿邁勒查特吉的個人經歷能說明，在當今時代，將世界簡單劃分為「東與西」有些含混不清，甚至大而無當——他出生於斯里蘭卡，在印度長大，曾在愛爾蘭生活，擁有英國國籍，目前定居在阿姆斯特丹。他說，也許我屬於東方，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東方，魯德亞德吉卜林(Rudyard Kipling)曾經寫道：「東是東，西是西，直到天地共為上帝審判之位，這兩者永不相交。」這種絕對的殖民時代已經逝去，而我們目前都處於十字路口，各種文化因素也在不斷周遊四方，有競爭就有碰撞，有碰撞就有覺醒，交流、融合和創新。印度詩人蘇迪普森亦聲稱，在不能輕易界定何為「東」，何為「西」的前提下，未來如何是無法進行討論的，他說：「我是印度人，但我用英語寫作，英語也是我的母語。」

無論如何詮釋或質疑這次題目的意義，駐市作家們仍然將按照東道主的安排，參加以「文學與東西方的未來」為主題的兩場報告會、與上海作家的座談交流、訪問復旦大學並與師生對話，參加泰戈爾詩歌朗誦會、新書研討會。儘管這一系列的活動和期待都「非常熱情」，他們也能夠向中國讀者朗讀自己的作品，與陌生的聽眾通過即時翻譯就文學創作展開討論，但很多作家聲稱，整個寫作計劃有一種無法言喻的異樣之感——在連軸轉的參加一個又一個的官方活動之餘，他們從未弄清楚「寫作計劃」具體是甚麼，而上海本地作家看起來很難接近，幾乎沒有和他們真正交流的機會。駐市作家們在上海的時間已經過半，或許他們已經體會到了某種中國特色的、不可言喻的神秘性。

回到1個世紀以前，保羅·克洛代爾這位年輕的「駐華作家」，在中國各地遊歷任職外交官，渡過了15個年頭，直到「新的陽光」逐漸褪色，才經由西伯利亞鐵路轉回到法國，而他在中國期間所寫的散文詩，於1928年在法國結集出版。這本題為《認識東方》的小書，為當時只能從傳教士的見聞錄中一窺東方的歐洲，帶去了對古老中國的詩意素描。

不知從世界各地一天之內飛來上海的駐市作家們，在不長也不短的兩個月之中，對轟轟烈烈國際化進行時的當代中國，是否還能有幸如克洛代爾，汲取最原始的、探險者般的靈感，寫出屬於自己版本的東方傳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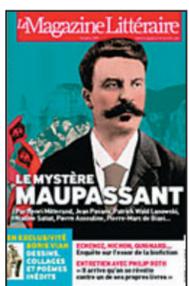


要刊書事

Magazine Littéraire

《文學雜誌》10月號：(法國)
藉着這一期以莫泊桑為主題的月刊，《文學雜誌》為這位現代小說的奠基人描繪了一幅對比鮮明的畫像：他與他母親羅拉的關係，與他那位仿如養父的老師福妻拜的關係，以及他對叔本華的興趣，乃至他性格中的多重面貌——紅燈區的常客，笨拙的詩人，出版部大臣的僱員……

左拉認真地說過，莫泊桑那副帶柄眼鏡底下的濕潤眼睛，是從「拉伯雷、蒙田、莫里哀、拉封丹，那些巨大而有先見之明的身影，我們文學的曙光」繼承而來的。但一個世紀之後，這位《項鍊》的作者卻在文學史上變成了一個謎……



The Economist

《經濟學人》03/10：(英國)

美國經濟未見起色，對奧巴馬的功過是非已有專著出版。最近一本新書「Confidence Men」，作者Ron Suskind從奧巴馬行政班子的起步說起。很顯然，都不會是好話。作者指責奧巴馬總統是個不稱職的管理者，不能很好的掌握自己下屬的言行。而總統的行政班子則在書中被刻畫為異常傲慢，甚至膽敢違背奧巴馬的指令。作者的諸多指責在書評人眼裡則充滿了事實性錯誤，並有刻意攻擊奧巴馬之嫌。



The New Yorker

《紐約客》03/10：(美國)

暴力的出現與人類發展歷史相伴，《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》的作者Steven Pinker試圖嘗試建構一個暴力的歷史。在研究中，作者發現，儘管現代社會的大眾媒體不斷的向觀眾展示那些暴力的畫面，但是那些暴力行為放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，根本算不上甚麼。書評人對其假設則有所保留，因為作者根本就忽略了歐洲以外的社會進化，不僅如此，就算是歐洲歷史裡發展中的殘忍部分，也直接被作者剔除了。因此，書評人認為，儘管此書帶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觀點，但處理的方法過於簡單。



The Atlantic Monthly

《大西洋月刊》9月刊：(美國)

亞馬遜的威力有多大？他們對當前的出版業又有着怎樣的影響？作者Peter Osnos舉了一個例子。2009年，一本名為《Food, Inc.》熱銷，8萬5千本的成績讓它很快登上了《紐約時報》的暢銷書榜。當銷售熱潮一過，出版商就同意將其電子版放在亞馬遜網站的「Kindle Daily Deal」目錄中交易。從實體轉向電子書的降價結果，令該書在24小時內，又賣出1萬4千冊。Osnos認為，這就是亞馬遜如何令出版市場改變的活生生的例子。前者迫使出版商以最低價格售出電子版本，他們自己卻能從中獲得極大利益，因為其中最大的收入是來自閱讀器。隨之而來的，則是出版社的虧本。

